

結論

以上的述論，筆者認為，中國知識份子在晚清近六十年間，對俄羅斯認識的整個走向以及特徵，有兩個最大的問題，而且是頗有關係的。第一個問題是俄人於十九世紀中侵略中國之前，知識份子對其認識偏重的方向，集中於立書著籍的記載，以及針對書中疑義而辨釋，卻缺少對俄國人的心態與行為有所了解；其次，把 1858 年到 1895 年間當作是一個過程來看，一方面朝野對俄國認識的不足，導致連番失地喪權，直到新疆的回變以及伊犁被佔，才發覺事態嚴重，而加強對俄人的戒備；另外，防俄的主張是隨著實際事件的發生而逐漸形成的，一直未能爭取先機，處於被動。以下就上述問題分析，並作為本文結論。

一、對俄人基本認識的不足

先是從 1842 到 1859 年，這段期間以知識份子對俄羅斯的記載為主，透過第一章以及第二章前半，選擇三個較具有意義的部份進行述論，得到的結果是，影響知識份子對俄國認識的因素，在於他們討論俄羅斯時，夾雜著受到傳統以及西方人傳入的地理與歷史知識，遂使他們一方面根據傳統史料記載，合理化俄羅斯與「烏孫」、「烏洛侯」、「吐蕃」等游牧民族之間的關係，解釋俄羅斯一系的組成來源，是從東方發跡的，沒有注意到由歐洲本土進入俄國的民族的重要性，忽略俄國人當時根本沒有佔領西伯利亞的事實；對於俄國的歷史發展以及向外擴張的問題，從俄王世系的出入，到眾人爭議「控噶爾」究竟是何國等問題，可看出他們對俄人的歷史還是不了解，而且執著於舊史的辯證，沒有去深入廣泛的探討俄國人為何要四處擴張，跟他們的性格、環境是否有關聯，故 1859 年前，知識份子累積對俄國真正的認識並不多。能給予後人的啟發相當有限。

二、 俄人的侵略與「防俄主張」的檢討

第二個部份，大約在 1858 到 1895 年間，從大方向來看，在璦琿條約到伊犁交涉的這段期間，一方面沒有人能夠看清俄國的目的，如與西人有接觸之官員曾國藩、李鴻章，對俄人來華的目的亦茫然不清；另外，清廷本身以平定內亂為先的態度，也是讓俄人得寸進尺的重要原因，遇俄人的無理蠻橫，以採取消極防止俄人生釁為主，自談不上正視俄人的侵略而致力於圍堵；至於逐漸興起的「防俄」主張，雖為知識份子從觀察天下大勢，發現西洋的歷史發展與彼此的利害關係與春秋戰國時代極為相似，所以援引古法，希望達成各國聯合以抗俄的目標；但是他們仍未能了解，各國立國精神、所處環境，以及社會文化並不相同，利害亦不一致，何能團結一致，更如何能無懼俄人怨恨而幫助中國呢？，另外，甲午戰後，一位知識份子藉由讀《海國圖志》而有所覺醒：

自古夷狄之向中國，非誠有實心感戴。之所以效順者，冀獲利耳。康熙中雖聯荷蘭以款俄羅斯，又聯俄羅斯又逼準噶爾，然其時海禁尚嚴，通商者寡，故荷與俄欲因此以為通商之地，豈真視中國之患，如疾痛在身，不惜財力以求去之乎？籌海篇，以夷攻夷之策其不足恃也，明矣，今日泰西諸大國以中國為外府者幾，數十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，不獨剝我脂膏，並且佔我疆土，而中國無力以禁之，故每欲得而瓜分焉。至於各國啟釁，其兵艦相若也；槍炮相若也；將帥士卒之勇悍亦相若也；一交綏則肢骸滿地血肉雲飛觀普法相持一役而死傷之酷可以類推。故今日各國之有心人議立弭兵之會，誠恐戰事開而其禍不可問也，其於中國則不然，如鐵之在鎔，惟冶者之所為，肉之在庖惟宰者之所制，彼豈肯捨其易而攻其難，聽中國之計，而開百世之仇哉？故以夷制夷之事萬不可望之外夷也。¹

這段話可以說是至理名言，點出自魏源以來，提倡「以夷制夷」，以及融合西方的主張，幾乎可以說是相當困難，甚至可以說有畫餅充飢的味道。中國對洋人來說，根本就是受宰制的，無論是英、法、德、俄等國，當他們插手干涉中

¹《沅湘通藝錄》（五），讀魏默深先生海國圖志，頁 18~19。

國的外交事務時，主要是為了自己國家的考量而做的，不可能為了中國而互相交戰；又如今人蔡東杰所言亦可證明，「各國對中國虎視眈眈，中國得到援助的機會可謂極其渺茫；而極少數成功例子，如三國干涉還遼行動，也是出自列強自身利益的結合，並非中國努力所致」²，知識份子雖然針對中國力不足以抵禦俄國，而提出結盟之法，但是缺乏對西人社會的瞭解，所以就「防俄主張」的內容來看，是不切實際，同時也沒有辦法進行的。

總之，從 1842 到 1895 年之間，整個知識份子對俄國的認識，根本是不足的，而且筆者認為，這半世紀多，對俄國的認識的失敗，開始時，知識份子並沒有要把俄國當成是對等，或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國家，如魏源等人，雖然在著述中屢屢提及前朝武功如何興盛，如何運籌帷幄而壓制俄人，或利用以夷制夷（以俄人制準噶爾、土爾扈特等部落），始終將俄國等同於所謂的「夷人」，既然不肯降下上國的心態，又何肯跳脫跳脫傳統史籍，主動或實際的進入俄人的歷史、社會，去作客觀認真的研究呢？即使在瓊瑋、北京等條約簽訂後，俄人已攫取中國大量的土地，而且兵船壓境，動輒對中國恫嚇威脅，不論朝野，已經有許多人逐漸感受到俄人對中國威脅的可怕，然而活躍在同光之際的知識份子，也仍然以紙上談兵的心態談防俄，真可謂心誠有，而力在何處，甚至還有知識份子，如王之春仍以中國為本位的觀念，探討俄國政治背景：

俄近日頗講求文治。而所讀多法國之書。法人多民主政，故俄之亂黨甚多。大旨謂俄貧富不均，國家賦稅重，思一切反之，易君主為民主焉，至所謂尼希里結黨最先，今已大半翦除，又俄制凡貴官多由世及，其讀各國書者頗自負才能，而名位反居其下，多有私意不平者。是宜急講中學，俾讀論孟五經，使知綱常之理，則在下者自不敢欺凌其上矣。³

王之春固然對俄國的反對黨人的主張不夠了解，也不知當時西方的風氣正是議會制度的流行。同時也認為俄人能經由學習論、孟、五經之後，才能瞭解上下剛常，避免以下凌上，然而俄國政治的亂象，卻正是貴族階級統治過於壓迫而

² 《李鴻章與清季中國外交》，頁 195。

³ 《使俄草》，頁 251 252。

引起的，也可看出對俄人認識之狹窄不清。

所以，不管是咸豐末年之前，或者是俄人已經侵略中國之後的知識份子，對俄國都缺乏一個正確的基本認識，自然無法洞悉俄國人的動向，對俄人當然也缺乏警覺心了。是故清季這五十年多，中國知識份子對鄂羅斯的認識，既乏廣度，又缺深度，根本不出任何切乎實際而有效的方案，清帝國目睹俄人積極的侵略，也只要一籌莫展，坐待其步步進逼與深入，終至積重難返，實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大憾事。